

林慶彰 主編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六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7 冊

皮日休的生平與思想  
——兼論其在唐宋之際思想變遷中的角色

江 政 寬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皮日休的生平與思想——兼論其在唐宋之際思想變遷中的角色／江政寬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9〔民98〕

目 2+142 頁；19x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編；第 17 冊)

ISBN : 978-986-254-068-8 (精裝)

1. (唐) 皮日休 2. 傳記 3. 學術思想 4. 知識分子 5. 唐代  
6. 宋代

112.41

98015275

ISBN - 978-986-2540-68-8



9 789862 54068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七冊

ISBN : 978-986-254-068-8

皮日休的生平與思想

——兼論其在唐宋之際思想變遷中的角色

作 者 江政寬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30 冊 (精裝) 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皮日休的生平與思想  
——兼論其在唐宋之際思想變遷中的角色

江政寬 著

## 作者簡介

江政寬，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教學研究之餘，亦從事翻譯，譯有《法國史學革命》、《新文化史》、《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後現代歷史學》、《馬丹蓋赫返鄉記》、《永樂皇帝》、《何謂歷史》等書。

## 提 要

本書試圖通過對皮日休的研究，揭示晚唐思想的部分面相，以及中唐儒家復興所延續下來的某些趨勢。書中側重於重構皮日休的生活世界，以及他的思想和時代的關連，鋪陳的重點包括皮日休進士及第前的遊歷和干謁活動，藉此勾勒晚唐科舉考試的某些面貌和舉子的情狀；亦包括他對儒家經典的觀點，他同中唐以降的古文運動、新春秋學風、新樂府詩運動的關係，以及他的社會政治評論；以此闡明他的思想中那些理念是他獨到的見解，以及那些看法是反映時代的心態和思想趨勢。本書並非一般意義的文學家傳記，主要的目的乃是通過皮日休的生平和思想，考察唐宋之際思想變化的某些趨勢。因此，本書的論述雖以皮日休為中心，然而，書中所討論的議題之開展，則是扣合到這些思想的變遷趨勢。

本書的篇章架構除導言、結語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中唐的士人與學術思想氛圍，分述古文運動與新春秋學；第二章介紹皮日休的早年生活，附及其交友考述；第三章說明皮日休寓吳時期的生活以及離吳後的晚年事跡，其死因亦有考論，附及其交友考述；四、五兩章分別探討皮日休的思想，包括他的儒道觀、社會政治思想、淑世濟民的詩歌精神之繼承、對釋老的態度以及後期思想的道家傾向。第六章從王通復興、孟子學的興起及韓愈地位的上升等三個角度來論述皮日休在唐宋之際思想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附錄並蒐錄皮日休作品補遺與輯評以及今人研究目錄。



# 目

## 次

導 言 .....	1
第一章 中唐的士人與學術思想氛圍 .....	5
第一節 古文運動 .....	6
第二節 新春秋學 .....	8
第二章 早年生活 .....	15
第一節 世 系 .....	16
第二節 生平與童年 .....	19
第三節 鹿門隱讀 .....	21
第四節 尋求仕進 .....	22
附 錄 交友考述 .....	28
第三章 吳中唱遊與晚年事跡 .....	31
第一節 吳中生活 .....	32
第二節 死因探考 .....	38
附 錄 交友考述 .....	42
第四章 皮日休的思想（一） .....	49
第一節 儒道觀 .....	49
一、「道」與「古」 .....	50

二、爲政之道 .....	56
三、立身處世之道 .....	58
第二節 社會政治思想 .....	60
一、君臣關係 .....	61
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	65
三、社會政治評論 .....	69
第五章 皮日休的思想（二） .....	77
第一節 淑世濟民的詩歌精神之繼承 .....	77
第二節 對釋老的態度 .....	82
第三節 後期思想的道家傾向 .....	85
第六章 唐宋之際思想變遷中皮日休的角色 .....	95
第一節 王通復興 .....	96
第二節 孟子學的興起 .....	103
第三節 韓愈地位的上升 .....	110
結 語 .....	115
參考書目 .....	119
附 錄 .....	131
附錄一 皮日休作品補遺與輯評 .....	131
附錄二 今人研究目錄 .....	136
後 記 .....	141

# 導 言

中唐儒家復興至北宋儒學運動的興起之間，是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一段重要的過渡時期。這段時期不祇是「舊」儒學與「新」儒學傳統之間的變化，亦是從魏晉以來佛、道鼎盛的局面，轉折為以儒家為主導的近世學術文化傳統的肇端。

十一世紀中葉，北宋仁宗慶曆年間宋學崛起，此後波瀾壯闊，蔚為大國。儘管北宋的儒學運動在中國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學界對於這個運動的根源和形塑過程，仍未發展出較有系統的解釋。誠然，北宋新儒學不是一驟起的思想革命；它源自於一個漫長且複雜的思想轉變，其源頭可溯自中唐的儒家復興，但不容小覷的是，介於其間的晚唐五代，則是起著形塑的作用。

在解釋本書希冀達到的目標，以及何以選擇此一題目作為研究論旨之前，筆者想稍加說明目前學界對於晚唐五代儒家思想的一般印象和研究概況。

首先，論者對於儒家在晚唐五代的處境，普遍的看法是，由於這段時期的持續動亂，使得儒學的發展喪失其思考所必需的外在條件，因此陷於停滯狀況。直至北宋統一的局面穩定下來，儒學才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註1）

其次，既然學界這段時期的刻板印象是，儒家思想的發展陷於停滯狀態，其思想自然無甚可觀，這種態度使得我們對唐末五代的學術思想研究成果，

〔註1〕此一看法堪以張躍作代表。他的《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一書，所指陳的「唐代後期儒學」，事實上祇涉及中唐儒家復興，對於晚唐五代的儒學思想，則三言兩語帶過，著墨甚少，參見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成績極為有限，具深度且專門的討論著作幾乎不存在，因而造成中唐儒家得興與北宋儒學運動之間的可能關聯，變成遺失的環結（missing link）。

本書主要討論的對象皮日休（840～881？），一般皆視其為文學家，而其儒學思想則不曾受到嚴肅的探討。目前有關皮日休的研究，大體上可分成二類：一類著眼於他在文學層面的表現；另一類則是意識形態掛帥，強調其思想的進步性。

前一類探討皮日休文學成就的專門著作，有尼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的《皮日休》（*P'i Jih-hsiu*, 1979）和王盈芬〈皮日休詩歌研究〉（1992），另外日休與陸龜蒙的比較研究，尚有姚垚〈皮日休陸龜蒙唱和詩研究〉（1980）、楊妙燕〈皮日休與陸龜蒙的散文研究〉（1992），以及晚近大陸學者王錫九所著的《皮陸詩歌研究》（2004）；其中王、姚和楊三者皆為臺灣中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這些著作的研究方向，極清楚地是以皮日休的文學表現和文學觀為重心，文中對其思想僅僅略有觸及，至於他在唐宋之際思想變遷中的角色，則是無所措心。

後一類作品之作者幾乎皆為大陸學者。他們對皮日休表現出頗高的興趣和熱忱，不過，看重他的原由卻非基於他在文學史或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而是由外緣因素引起。他們在論及日休時，通常免不了會增添一筆，強調他是「歷史上唯一參與農民起義的進步封建文人」。（註2）

然而，不論上述二類作品研究皮日休的背後動機為何，其共同趨勢主要聚焦於他在散文和詩歌方面的表現和成就；這一點與我們的關懷有極大的不同。

本書試圖通過對皮日休的研究，揭示晚唐思想的部分面相，以及中唐儒家復興所延續下來的某些趨勢。筆者將側重於重構皮日休的生活世界，以及他的思想和時代的關連。書中鋪陳的重點包括日休進士及第前的遊歷和干謁活動，藉此勾勒晚唐科舉考試的某些面貌和舉子的情狀；亦包括他對儒家經典的觀點，他同中唐以降的古文運動、新春秋學風、新樂府詩運動的關係，以及他的社會政治評論；以此闡明他的思想中那些理念是他獨到的見解，以及那些看法是反映時代的心態和思想趨勢。本書並非一般意義的文學家傳記。筆者的主要目的，乃是希冀通過皮日休的生平和思想，考察唐宋之際思想變化的某些趨勢。因此，本書雖以皮日休為中心，然而，我們所討論的議

---

[註 2] 詳見附錄二相關之篇目。

題之開展，將扣合到這些思想的變遷趨勢；至於，同此主題無直接關連的部分，諸如他的詩歌表現技巧和散文的創作藝術，如有提及之時，祇是作為相關背景的說明。

選擇皮日休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三個理由：

其一，中唐儒家復興以降至北宋儒學運動崛起的歷程裡，晚唐五代介於其間，然而，我們對於這段過渡時期的思想研究，卻極為不足，因而研究皮日休的思想將有助於我們了解儒家思想在晚唐的面貌和處境。

其二，皮日休的關懷和興趣，涵蓋了中唐儒家復興的幾個側面，舉凡新春秋學風、古文運動，以及關係稍遠的新樂府運動，皆有所涉及。通過皮日休的思想，我們可以檢證中唐的知識分子，其所提倡的儒家理念在晚唐落實與延續的狀況。

其三，儘管中唐儒家復興的理念，在皮日休的思想烙上深刻的印記，再者，他也以韓愈的追隨者自居，然而，日休並非全然重彈舊調，他亦提出一些獨到的看法。這些看法除了反映唐宋之際的思想變遷趨勢之外，同時亦在宋初的士人群體中，激起不小的迴響。職是之故，皮日休成為我們研究唐宋思想變革的一個重要參考點。換句話說，有關北宋新儒學興起前的形塑過程，惟有對這段時期的過渡型人物作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們獲得周全適切的認識。



# 第一章 中唐的士人與學術思想氛圍

皮日休生於唐敬宗開成五年（840），這個時期已是一般所謂的晚唐。這一年上距安史之亂（755～763）已有七、八十年的光景，安史亂後帝國所暴露出來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潛在之危機，歷經這段時間的惡化，已難以挽回頽勢。曾經光輝一時的大唐王朝，一步一步邁向了崩潰之途。（註1）

安史之亂所帶來的巨變，帶給中唐的知識分子極大的衝擊。這個動亂深深地激起許多知識分子的儒家意識，如何以儒家的價值和理念，重整政治秩序，對他們而言，顯然是當下最迫切的課題。八世紀下半興起的古文運動和新春秋學運動，即是中唐士人對此變局的省思和反應，這些知識分子結合志同道合的友人，大力宣揚儒家理念，不論就影響力和思想深度，皆將醞釀近半世紀的儒家復興運動帶到高峰。

儘管皮日休未及參與中唐的儒家復興運動，但他自覺地繼承此一運動的主張和精神。為了能更適切地勾勒皮日休的思想內涵及來源，我們有必要對中唐的幾股思潮，尤其是春秋思想和古文運動作一番敘述，藉此凸顯他的思想同中唐儒家復興的關係，以及在晚唐的意義。

(註1) 參見李必忠，〈論唐玄宗時期的社會矛盾——兼論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原因〉，輯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二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37～162；趙和平，〈唐代兩稅法實行後的兩個突出的問題〉，輯入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59～277；袁英光，〈試論唐代藩鎮割據的幾個問題〉，輯入中國唐史研究會編，《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68～291；盧建榮，《咆哮彭城：唐代淮上軍民抗爭史（763～899）》（臺北：五南，2008年）。

## 第一節 古文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的出現，有文學發展的內在因素，亦有外在環境的刺激。就文學層面而言，古文運動的興起可溯自唐代的古詩運動，同時也深受當時通俗文學的影響（註2）；另一方面，它又與文體改革的發展有密切關係（註3）。此外，古文運動與墓誌散文化的趨勢亦有關連（註4）。至於外在環境的刺激，主要是指安史之亂所造成的危局對知識分子內心的衝擊。在此我們關切的，是此一動亂與古文運動興起的關連。

古文運動的先導人物，如蕭穎士（717～759）、李華（715～766）、元結（719～772）等人，皆深受安史之亂的洗禮，對於時代的創傷，感受格外深刻；戰亂的體驗，使得他們極為強調文章在現實層面的功能。蕭穎士在〈贈韋司業書〉即云：

丈夫生遇昇平時，自爲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雍熙，遺名竹帛；尚應優遊道術，以名教爲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註5）

他主張文章應有「沮勸之益」，且有助於「名教」；換句話說，依蕭穎士的看法，文章是教化的工具。

李華在〈贈禮部鄭尚書清河孝公崔灝集序〉一文，所表現的文章觀念是：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作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遜矣。論及後世，力是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寢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

〔註 2〕 詳見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東大，1991 年），頁 16～19；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17～23；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 年），頁 217～246。

〔註 3〕 詳見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1～6。亦參見 Yu-shih Chen, "Introduction: The T'ang Ku-wén Movement", *Images and Ideas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Studies of Four Master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1988。

〔註 4〕 盧建榮，〈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臺北：麥田，2006 年），頁 37～49。

〔註 5〕 《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三二三，頁 3275 上。

與於古歟！〔註6〕

他強調文章須表現時代以及改造社會的功能，他所謂「化人成俗，安危存亡」，顯然是與安史亂後日趨紊亂的時局有關。

至於元結更是明白表示，其文章的觀念因安史之亂而產生轉變。他在〈文編序〉中，指陳他過去的舊作乃是「優游於林壑，快恨於當世」，「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然而，在「更經喪亂」之後，他的文學有觀念有了明顯的變化，他自稱：

……所爲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著、多傷閔者，其意必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世勸之俗所須者歟？〔註7〕

由元結的例子，我們更可清楚看出，喪亂的體驗，激發出他的儒家理念，也因此改變他的文章風貌。

除了上述三人之外，包括賈至（718～768）、獨孤及（725～777）等人，他們皆有類似的思想傾向。這些思想傾向有三方面值得我們一提。其一，儘管他們所作的努力基本上是在文章的寫作上，但他們亦對儒家經典表現出高度的興趣。其二，他們強調儒家價值，特別是有關社會與政治秩序的部分，這些理念不是空言，而是他們應當付諸實踐的。其三，他們的文章觀念涉及兩方面，一是內容，另一是文體；他們提倡寫作文章目的是明道，同時亦反對當時流行的駢體文。〔註8〕

古文運動自然以韓愈（退之，768～824）和柳宗元（子厚，773～819）最具有代表性〔註9〕。古文運動的成員對「文」與「道」的關係，儘管在看法不盡相同，但卻有一個清楚且共同的基本理念，即是文章的寫作應以促進「道」的實現為目的。柳宗元曾說：「道假辭而明」〔註10〕，又云：「文者以明道」〔註11〕。亦即他的基本見解是文章應為「明道」而作。在子厚心目中，「文」與「道」的關係有二端，其一，文章是明道的一種有效的工具；其二，

〔註6〕 《全唐文》卷三一五，頁3196上～下。

〔註7〕 《全唐文》卷三八一，頁3872下。

〔註8〕 詳見 Jo-Shui Chen, *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2), pp. 26~28。

〔註9〕 相關的討論，參見 Yu-shih Chen, *Images and Ideas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Studies of Four Masters*, 第一、二章。

〔註10〕 《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報崔黯秀才為文書〉，頁886。

〔註11〕 《柳宗元集》，〈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頁873。

儘管「文」與「道」有密切關係，但兩者並不能等同。<sup>(註 12)</sup>

至於韓愈則說：

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sup>(註 13)</sup>

又云：

愈之爲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

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sup>(註 14)</sup>

至此，古文運動與儒家義理已密不可分。<sup>(註 15)</sup>

韓愈與柳宗元之後的世代，以文章作爲明道工具的文學理念，逐漸在古文運動陣營中，讓位於怪奇的寫作主張。這個運動的焦點，似乎已移轉到寫作風格的嘗試上，孫樵即是一個最佳的例子<sup>(註 16)</sup>。儘管他們仍聲稱文章的目是爲了明道，但顯然此一主張已不再是古文運動的重心。晚唐的儒家運動已同古文運動愈行愈遠。

要之，古文運動的先驅者，其關切的焦點在於文體的改革，至於韓、柳的世代，儒家的義理與古文運動之間則有極爲緊密的關係，其後「文」與「道」又逐漸分離，直到北宋古文運動興起時，才又產生密切的關連。

## 第二節 新春秋學

與古文運動的興起相呼應的，是一部分學者以新的態度研究儒家的典籍，使得經學產生變化。《新唐書》曾云：

大曆時，(啖)助、(趙)匡、(陸)質以《春秋》，施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sup>(註 17)</sup>

---

[註 12] 詳見 Jo-Shui Chen, *Liu Tsung-Yuan*, pp. 132~133。

[註 13] 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6 年)，〈答李秀才書〉，頁 102。

[註 14] 《韓昌黎文集校注》，〈題哀辭後〉，頁 178。

[註 15] 關於韓愈的文學觀，詳見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增訂三版)，頁 229~237；鄧潭洲，《韓愈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五章；Charles Hartman, *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6)，第四章。

[註 16] 詳見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頁 308~320。

[註 17] 《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四版) 卷二〇〇，〈儒學下〉，頁 5707。

這些學者治經，皆有新說，故能「自名其學」。他們以意說經，非僅是明經，其志本志經世。在這些專學中，如欲撥亂反正，當首推春秋學；其中，啖助、趙匡、陸質等人，是其代表性人物。<sup>〔註 18〕</sup>

啖助（叔佐，724～770），關中人。天寶末年，客於江東，因逢安史之亂，寓居於江南，遂以文學入仕，任臺州臨海尉，終於潤州丹陽主簿，任滿後，在家著述。上元辛丑歲（761），正當安史之亂第六年。上一年年底，浙東一帶尚有劉展之亂，侵擾潤州、升州等地。<sup>〔註 19〕</sup> 災禍不斷，藩鎮跋扈，這對啖助的春秋思想有直接的影響。趙匡（伯循，fl. 770～780），天水人，曾任宣歙觀察使陳少游的幕僚，官終洋州刺史。他曾謁訪啖助，兩人「深話終義，事多響合」。<sup>〔註 20〕</sup> 二人皆北方人，前者因安史之亂而流寓南方，後者則是深受其害，因而對此動亂帶給國家和人民的災難性後果，有深刻的認知。

陸質（伯淳，737～805），吳人，原名淳，避唐憲宗諱，改名爲質。他曾師從啖助。啖助死後，伯淳同啖助之子共同整理啖助的遺稿，復以遺稿請教趙匡，最後由陸淳匯整編纂。趙匡充實、發揮了啖助的學說，而啖、趙之學經過陸淳的整理和傳衍之後，逐漸爲時人所知。後來，陳少游爲淮南節度使時，陸淳入其幕，任淮南從事。唐德宗、順宗年間，他受知於韋執誼，更名爲質，稍後參與了所謂的「永貞革新」。<sup>〔註 21〕</sup> 啖助一派的學說，因陸質的推廣，受到政治上革新傾向的士人重視，因此該派的思想開始對當治政理念和學術風氣產生鉅大的影響，亦對日後的學術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sup>〔註 22〕</sup>

〔註 18〕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1990 年再版），頁 234～236。

〔註 19〕 詳見《新唐書》，卷一四四，頁 4702；《通鑑》，卷二二二，頁 7101～7104；C. A. Peterson, "Court and Province in Mid-and late T'ang", in Denis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Part 1,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 pp. 464～560。

〔註 20〕 詳見《春秋集傳纂例》卷一，〈修傳始未記〉；《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下〉，頁 5705～5707。

〔註 21〕 關於陸質史書上之記載，見《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四版），卷一八九下，〈儒學下〉，頁 4977～4978；《新唐書》卷一六八，頁 5127～5128。有關「永貞革新」的相關分析，參見 Jo-Shui Chen, *Liu Tsung-Yuan*, pp. 66～77。

〔註 22〕 以下的討論，很大部分參考了這些著述：劉乾，〈論啖助學派〉，原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 年一期，頁 59～71，輯入林慶彰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頁 678～701；章群，〈啖趙陸三家春秋之說〉，《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1974 年），頁 149～159；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第二章第三節。

以啖助爲首的這個新春秋學派，他們的觀點有二方面值得注意。其一，這個學派主張回歸經書，泯除三傳的門戶之見，變「專門」爲「通學」，同時強調研究《春秋》最終的目的是探聖人之心。啖助在概述三傳對《春秋》宗旨的詮釋時，曾指出三者認知的差異：《左傳》認爲，孔子作《春秋》係鑒於「周德衰，典禮喪」，爲了上守周公遺志，下明將來之法，因而假魯史而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公羊傳》稱《春秋》乃是「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穀梁傳》則云，《春秋》的目的在於「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註 23）

然而，「三家之說，其宏意大指，多未之知」（註 24），三傳不僅未能掌握聖人的精神，反而造成門戶之見。啖助說：

先儒各守一傳，互相彈射，仇讎不若。詭辯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蓋令後人不識宗本，因注迷注，黨於所習。（註 25）

其流弊是使人們「不復知有《春秋》微旨」。（註 26）

依啖助的看法，《左傳》原爲左氏得數國之史，彙整以傳門人。但弟子們因口耳相傳，在傳衍過程中，添加了許多公卿大夫的家傳，以及卜筮縱橫、小說家之言，故失其原意。至於《公羊》和《穀梁》亦爲口耳相傳，後人依其大意，將二傳散配於經文，因而產生很多錯誤（註 27）。趙匡亦指出，三傳的作者俱爲孔子的再傳弟子，「公、穀守經，左氏通史」（註 28）。職是之故，三傳互失經旨，乃無可避免之事。啖助感歎說：

微言久絕，通儒不作。遺文所存，三傳而已。傳已互失經旨，注又不盡傳意，《春秋》之意幾乎泯滅。（註 29）

爲了突破這種墨守章句的學風，以及其伴隨而來的流弊，他們採取的策略是以經駁傳，大膽地懷疑和否定歷代學者對於《春秋》的詮譯。啖助即自稱：

考究三傳，拾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無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註 30）

[註 23] 均見《春秋啖趙集傳纂例·春秋宗指議第一》。

[註 24]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第五》。

[註 25]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三》。

[註 26] 同註 25。

[註 27]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一》。

[註 28]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第五》。

[註 29]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一》。

[註 30]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三》。